

# 中国为何坚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 王东京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发达国家相继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却一直保持稳健。近几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人主张我们也应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年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将重点从理论层面作分析。”

## 从20世纪50年代一场关于货币政策的争论谈起

上世纪50年代,国际上围绕货币政策发生了一场“规则”与“权变”之争。以国家干预经济为基调的凯恩斯学派,倡导“相机抉择”的所谓“权变”政策。在他们看来,经济生活仿如一条有着荣枯周期的河流,而货币供应就是一道闸门,政府作为“守闸人”,应时刻根据“河流”的荣枯状况,相应地关闭或开启“闸门”,从而达到平衡货币供求、缓解经济波动的目的。

然而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一股反对“权变”的旋风从美国东部刮起,其代表人物是货币学派的掌门人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指出,“权变”政策不仅不能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容易造成经济大起大落。他认为政府应把货币供应增长率相对稳定在与经济增长率大体一致的水平上。此主张称为“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为何主张要用“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他通过研究大量的货币资料发现,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变化到经济生活中反映出这种变化之间存在两个“时滞”期: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平均需在6至9个月以后才能引起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而在名义收入和产量受到影响之后,平均要再过6至9个月价格才会受到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生效的时间往往要一年或一年半以上。

正因为存在12至18个月的“时滞”期,于是弗里德曼提出推断:由于中央银行无法掌握实施“权变”政策所需的必要信息,也无法准确预知现实社会对货币政策反应的程度,这样央行在扩大和收紧货币供应时,往往容易做过头:要么对经济刺激过度,要么对经济紧缩过度。而无论出现哪一种结果,皆会令经济更剧烈的波动和更不稳定。

弗里德曼进一步分析说,“权变”政策虽能在短期内控制失业,但时间一长失业率便会反弹。因为增加货币供应虽能压低利率、刺激投资,但随着投资不断扩大,人们收入会增加;人们收入增加后会对商品需求增加。而需求一旦大于供给,物价水平上涨就会带动利率上升。如此一来,又会使投资减少、失业增加。

二战以来的事实证明,实施“权变”政策确实让不少国家经济陷入了怪圈:“为减少失业—增加货币供应—利率下降—投资扩大—收入增加—物价上涨—利率反弹—投资收缩—失业增加。”所以弗里德曼说,政府与其手忙脚乱地改变货币供应,倒不如实施“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并强调“简单规则”是确定货币供应的航线,只要不偏离此航线,便可避免经济大幅波动。

是的,由于“权变”政策无法解决西方国家“滞胀”问题,1975年左右,当时世界七大工业国家中有五个实行“简单规则”货币政策,瑞士、西德、日本曾用此规则成功地控制了通胀;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更是惟“简单规则”是瞻;

美国前总统里根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也把控制货币供应增长作为重要目标。

## 货币到底是“中性”还是“非中性”

追溯理论源头,最早主张“权变”政策的并不是凯恩斯,而是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1898年,他的《利息与价格》一经出版便轰动整个欧洲。关于维克塞尔对经济学的贡献,学界公认:他首次将价格分析与货币分析加以连接;并首次提出了“货币非中性”理论。

为方便分析,让我对维克塞尔的“货币非中性”理论作简要介绍:

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即价格由商品供求决定,货币供应增减只会影响价格总水平而不会改变商品比价,故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而维克塞尔的看法相反,他认为货币不仅是交换媒介,而且具有储藏功能。当人们卖出商品后不马上购买,货币被储藏,商品供求就会失衡,从而对经济产生影响,所以他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

维克塞尔据此还分析说:由于货币非中性,要想让商品供求恢复均衡就得用“利率”调节价格。而且借用庞巴维克的“自然利率”与“实际利率”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所谓自然利率,是指不存在货币时的“实物资本”借贷利率;而实际利率则是指“货币资本”的借贷利率。维克塞尔指出,自然利率不同于实际利率,前者不影响价格,后者会影响价格。

他的推理是这样:当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企业会觉得有利可图而增加贷款、扩大投资,投资需求增加会推高原材料、劳动力与土地等要素的价格。要素价格上涨,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增加,又会拉动消费品价格上涨,于是价格就形成了一个向上累积的过程。反过来,若实际利率高于自然利率,价格变动方向相反,会出现一个向下累积的过程。

于是维克塞尔得出结论:利率与价格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因果关系。而且由于货币的存在,实际利率往往会偏离自然利率。也正因如此,要想保持价格稳定就必须适时调控实际利率,让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保持一致。今天学界流行的“利率工具论”,正是由此而来。

对此论证不知读者怎么看。若仔细推敲,我们就会发现有多处疑点。如,维克塞尔说货币出现后实际利率会偏离自然利率就难以成立。根据庞巴维克的定义,利息是货币时差之价;而货币理论大师费雪将利息定义为“不耐”(急于消费)的代价。两人表述不同但意思相近,即利率高低取决于社会的忍耐程度,与借贷品是“实物”还是“货币”无关。

这样问题就来了:既然利率是由社会“不耐”程度决定,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就不可能偏离。维克塞尔认为可能偏离,是由于他将利息看成了货币的价格。事实上,利息并非货币的价格,也不由货币供求决定。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价格只能由它交换

的商品数量来体现。如一把斧头的价格为10元,则10元货币的价格为一把斧头。另一个证据,人类在货币出现之前利息早就存在了,怎能说利息是货币的价格呢?

关于价格上涨的原因,经济学说: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是因为商品供不应求;而价格总水平上涨,则是由于货币供过于求。换句话说,利率既不能改变某种商品价格,也不能影响价格总水平。照维克塞尔的说法,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企业会扩贷。可若不增加货币供应,企业无款可贷,利率怎可能拉高要素价格?要素价格不涨,要素所有者收入不增加,消费品价格怎可能上涨?可见,决定价格总水平的是货币量而非利率。

再想多一层:即便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可能出现偏离,请问在货币经济下央行能知道自然利率是多少吗?当然不可能知道。问题就在这里,既然央行不知道自然利率是多少,又如何去调控实际利率呢?由此看,调控实际利率使之与自然利率一致的说法,不过是维克塞尔根据“货币非中性”提出的一种设想。由于“货币非中性”理论不成立,此政策设想也就没有可操作性。

## 增加就业是否一定要承受高通胀

凯恩斯提出“权变”政策之后,有学者为了支持凯恩斯的观点,研究了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指出了通胀率与失业率会呈反向变化,即通胀率越高,失业率会越低;而失业率越高,通胀率会越低。并在平面坐标图上用一条曲线来反映这种关系,此曲线称为“菲利普斯曲线”。

这里要说明的是,菲利普斯本人当初研究的是工资率与失业率的关系。1958年他在《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分析了英国1861年至1957年工资与失业的数据,他发现历史上工资率上升的年份,失业率往往都相对低。因此他提出名义工资率变动是失业率的递减函数。

菲利普斯今天大名鼎鼎,可让他走红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文章。1960年,萨缪尔逊与索洛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关于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一文,他们以菲利普斯的研究作基础,用美国的数据替换英国的数据,用通胀率替换工资率,提出通胀率与失业率也呈反向变化的推论。其政策含义是,低通胀与低失业不可得兼;一个国家若要保持较低失业率,就得承受较高的通胀率;若希望保持较低通胀率,就得承受较高的失业率。

客观地讲,菲利普斯本人的结论并无大错,但那也只是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现象,因为菲氏研究所用的数据是二战前的数据。二战前,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尚未到来,机器自动化程度远不及今天高,那时工资率上升,表明企业用工需求大,劳动力供不应求,失业率当然会下降。可上世纪70年代后,智能机器的出现使企业对人工需求不再有刚性,工资率上升,企业有可能用机器代替人工,令失业率也上升。

那么萨缪尔逊与索洛的结论是否成立

呢?事实上,国际上已有不少学者对“菲利普斯曲线”提出质疑,不赞同简单地用通胀率替代工资增长率。而萨缪尔逊与索洛对为何要作这样的替代曾有三点解释:第一,价格等于成本加利润;第二,工资是企业的重要成本;第三,价格与成本变动方向一致。以上解释看上去无懈可击,但其实经不起推敲。

众所周知,现实中价格有卖方价、买方价、市场价三种形式。按成本加成定价是卖方价,若商品短缺,卖方价可以是市场价;但若商品过剩,卖方价便不是市场价。从国际上看,市场过剩是常态,故市场价格通常是由需求决定而非成本决定。这是说,工资上升会推高成本,而成本增加却不一定推高市场价格。

更要看到,商品价格的决定是微观经济行为,比如商品房的价格,就是由开发商与消费者讨价还价决定。而通胀率却不同,它是经济总量指标,其高低要由货币供求决定,弗里德曼说通胀始终是货币现象,是说只要货币不超量投放,成本不可能推动通胀,结构性因素也不可能推动通胀。通胀只能由货币需求拉动。

由此看,用通胀率替换工资率并不可取,由此推出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可信。如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通胀率上升,而失业率却不降反升。中国近几年货币政策保持稳健,通胀率(CPI)控制在2%左右,而就业却大为可观,政府希望每年增加1000万人就业,而每年实际增加就业1300多万人,目前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的较低水平。中国低失业而未高通胀,证明“菲利普斯曲线”也不成立。

## 中国的货币政策选择

根据前面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中国为何要坚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第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凯恩斯主张的“权变”政策虽然短期内对扩大就业有效,但长期会加剧经济波动,令经济陷入“一放就热、一收就冷”的循环怪圈。美国等西方国家曾经出现的“滞胀”是前车之鉴,中国经济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应保持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第二,“货币非中性”理论与“菲利普斯曲线”是通过历史经验数据归纳的理论,这两个理论皆经不起事实验证,说明它们并非科学的理论,这样也不能作为支持凯恩斯“权变”政策的理论依据。既然“权变”政策缺乏科学的理论支撑,当然不可简单照搬而作茧自缚。

第三,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有需求不足的原因,但主要是结构性问题,为此我们要毫不动摇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用通胀的办法刺激经济。中央提出今后几年要将CPI控制在3%以内,那么我们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相对稳健。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 加快培育新动能 推动高质量发展

□ 邓子纲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动力支撑。如何激发发展新动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发挥我国人力人才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巨大等综合优势,改革创新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机制,大力培育专业精神,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这为加快培育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通过坚持创新引领,优化制度供给,借力消费升级,培育新增长点,更充分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尽快培育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我国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

## 坚持创新引领,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谁牵住了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如何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发挥好科技创新对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支撑引领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既要瞄准国际前沿,支持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前瞻性基础研究,加强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加大创新人才和团队培养引进,还要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落实,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通道的“任督二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既要把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好地结合起来,加快实施一批重大技改项目,促进产品“有中新生”“老树新枝”,还要创新生产模式和服务理念,依托全产业链、市场规模等优势延伸服务链条,加快构建技术先进、生态完备的技术产品体系,实现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 优化制度供给,营造公平市场环境

制度供给是一系列促进要素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集成,这个集成制度的根本点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发新动能,离不开制度供给优化的支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优化制度供给,营造公平市场环境,就要不断减少行政干预,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成长;就要进一步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给予科研人才和团队更大的科研权限;就要打破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的行政垄断和流动壁垒,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形成市场竞争新格局;就要改革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和公正监管制度,加快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用公正监管管出公平、管出效率、管出活力。总之,要通过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优化制度供给,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而为培育新动能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 借力消费升级,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提高,消费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牵引作用日益提升。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大众化、规模化的产品,而更加青睐于个性化、定制化的一体化服务。因此,要以市场为导向,多渠道培育消费新增长点,通过改革推动资源向新供给形成和扩张的领域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消费供给;要采取多种措施,推动企业生产更加丰富的优质产品,释放潜在消费需求,挖掘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要畅通消费者与生产者对接渠道,顺应消费需求新变化,引导生产企业按需生产,扩大有效供给;要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传统零售类企业的提质增效,实现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优质消费体验。此外,还要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加强市场监管,改善消费环境,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让群众放心消费、便利消费,切实形成消费驱动增长新格局。

## 培育新增长点,实现重点行业新突破

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努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这为培育新增长点、推动重点行业实现新突破指明了方向。以新能源汽车发展为例,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2018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为127万辆和125.6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9.9%和61.7%。但依然存在核心技术依赖国外、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不够等问题。推动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要集中优势资源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围绕续航、动力等问题,鼓励企业提升自主研发、技术创新能力,创造出质量更高的产品满足用户需求;要加快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围绕“电力供应、场地供应、设备供应”三大问题,建立相关申报建设制度,使充电桩建设有法可依,简化报建程序,减少报建费用;要大力开拓新能源汽车国内国外市场,建议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扶持政策,加快出台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具体措施,加快建立开放、有序竞争的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营造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消费环境。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要抓好五个关键点

□ 张云泉

## 学术经纬

民营经济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撑起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面临缺乏核心竞争力、跟不上高质量发展要求等一系列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近年来,中央作出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各地纷纷在推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融资难题、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让民营企业家们坚定了信念和决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些都有利于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营企业要抓住新时代的发展机遇,提升内生发展动力,找准发力点,着眼企业理念创新、制度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产品

创新、技术创新,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其一,练就和提升看家本领,提升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语民营企业,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加强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这为民营企业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决策力、引领力明确了方向和路径。对于广大民营企业来说,要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要讲正气、走正道,做到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在合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要练好企业内功,特别是提高经营能力、管理水平,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还要拓展国际视野,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推动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样,就能在更广阔的舞台施展才华、大显身手,进而提升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其二,以宽广视野,找准市场定位和战略选择。**要以全球视野和全产业链视野,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准确寻找到最有利

的市场定位和战略选择。在这一过程中,要清晰确定自己企业的核心顾客人群是谁,哪个细分市场是自己应选择的目标市场,自己的品牌文化定位是怎么样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诉求是什么,有市场竞争力的供应链、价值链如何构建和完善,等等。

**其三,重视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增长核心竞争力。**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浪潮,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趋势,新市场环境所需要的产品创新、交付速度、个性化、小批量柔性需求等新变化,以前靠低成本优势等来获得市场竞争力的传统经验应该进行适时调整,企业唯有着眼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发展环境,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回归市场基本面,要深入调研了解顾客心中的“更好”需求是什么,以自主创新体系的构建作为关键抓手来应对顾客层面的需求变化,不断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持续开展适销对路的产品开发、设计产品组合、整合服务体系,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商业经营模式。

**其四,开展业务流程再造,完善企业的供应链和价值链。**要着眼制度化、标准化、

流程化的制度体系构建,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别要结合各类先进IT技术运用和大数据信息技术运用,打造经营管理信息系统平台,持续开展业务流程改造,不断提升企业内部管理优势、制度优势、流程优势,让企业所形成的经营管理能力能够主导供应链体系、能够主导投资和技术形成的价值链。

**其五,重视战略性人才资源的开发,打造符合自身特点的人才队伍。**企业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作为支撑。民营企业要把人才培养放在发展的突出位置,重视关键战略性人才资源的开发,如关键技术创新团队、中高层管理团队的塑造培养,提高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优势。民营企业应以绩效管理为抓手提升企业组织创新力,激发员工的发展潜力,激励团队学习创新,通过完善组织结构、绩效指标、奖励系统、职业生涯管理、培训等,加强团队执行力建设,打造符合自身特点的人才队伍,从而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和人才支撑。

(作者单位:厦门理工学院)